

## 鲁迅 “硬译” 的文化探源 = A cultural probe into Lu Xun’ s "Hard translation"

崔峰 Cui Feng

2014

Cui, F. (2014). 鲁迅 “硬译” 的文化探源 = A cultural probe into Lu Xun’ s "Hard translation".  
中国现代文学, 25, 125-144.

<https://hdl.handle.net/10356/83276>

---

© 2014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paper was published in 中国现代文学 and  
is made available with permission of 中国现代文学学会.

*Downloaded on 23 Mar 2025 09:56:00 SGT*

# 魯迅「硬譯」的文化探源

崔峰\*

## 摘要

魯迅「硬譯」的翻譯方法是其翻譯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對這一翻譯現象的解讀若僅局限於傳統翻譯研究中語言層面「忠實」、「對等」的批評方法，顯然過於淺顯和表面，因為這一批評方法忽視了「硬譯」背後豐富的文化內涵。本文將從文化研究的視角解讀魯迅為何在翻譯中尤其在翻譯理論著作中採用大量「硬譯」的翻譯方法，從四個方面對這一翻譯現象進行文化探源：即 1.佛經翻譯、理論著作翻譯與「硬譯」，2.知識份子、政治環境的操控與「硬譯」，3.文網與「硬譯」，4.語言的改造與「硬譯」及對魯迅語言觀的再思考。

**關鍵詞：**硬譯、譯經、政治操控、文網、語言改造

---

\* 崔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講師。

# A Cultural Probe into Lu Xun's "Hard Translation"

Cui, Feng\*

## Abstract

"Hard translation" is a method characteristic of Lu Xun's translation activity. Analyzing of this unique translation phenomenon should go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ritique of "faithfulness" and "equivalence" as it ignores the rich cultural connotation embedded in hard translation. The paper tries to unravel the reasons for Lu Xun's profuse usage of hard translation in his translation career, especially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ory boo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 A cultural probe into the phenomenon will be conducted from four aspects: hard translation in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and theory books; hard translation, the intellectuals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hard translation in the literary circle under the control of communism; hard translation in the language reform and rethinking of Lu Xun's views on language.

Key words: hard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classic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the literary circle under the control of communism, language reform

---

\* Cui, Feng: Lecturer,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ingapore.

## 一、前言

魯迅翻譯生涯若以翻譯方式的變換為標準，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 1903 年到 1909 年，早期的探索期，翻譯方式主要是「改譯」和「直譯」。<sup>1</sup>第二階段為 1909 年到 1928 年，翻譯方式以「直譯」為主，帶有「硬譯」；「硬譯」的物件主要是文藝理論著作。第三階段為 1928 年到 1935 年，仍以「直譯」為主，但「硬譯」的成份主要體現在翻譯俄國馬列著作上。那麼魯迅為何在翻譯中——尤其在翻譯理論著作中採用了大量「硬譯」的翻譯方法？目前研究者們較多地是引用魯迅原文中的解釋進行解讀，如「竭力使它歸化」、「儘量保存洋氣」、<sup>2</sup>「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sup>3</sup>這種解讀方式仍是囿於傳統翻譯研究中語言層面「忠實」、「對待」的批評方法，忽視了「硬譯」背後豐富的文化內涵。對魯迅「硬譯」的探究還需從更為宏大的文化背景著手剖析。

## 二、探源一：佛經翻譯、理論著作翻譯與「硬譯」

謝天振把人類的翻譯史劃分為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其中第二階段「為文字翻譯階段，也即人類進入文字翻譯以來的階段」，「由於這一階段所翻譯的物件主要是宗教典籍、文學名著、經典文獻，譯者、甚至讀者對這些原著都是取仰視態度，所以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這一階段，『忠實於原文的內容』成為翻譯家們最核心的翻譯觀——宗教典籍、文學名著、經典文獻這些著作都是翻譯者以及譯作的讀者頂禮膜拜的物件，翻譯時譯者當然要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否則一不小心歪曲了原文，招致批評不說，甚至因此獲罪都有可能。」<sup>4</sup>中國用文字記載的翻譯始於佛經翻譯，從漢末到宋初歷經一千多年，以隋唐為鼎盛，是我國翻譯史上第一個重要時期。這裡我所關注的是佛經傳入中國之初，翻譯家所採取的態度和翻譯方法。「今存最早帶有佛經翻譯理論性質的文章，一般認為當推〈法句經序〉」，<sup>5</sup>吳國居士、譯經名家支謙在該序中提出了「因循本旨，不加文飾」的主張，同時他也承認這樣翻譯佛經的效果將會是「詞朴」。<sup>6</sup>但在錢鐘書看來，支謙的〈法句經序〉「僅發頭角」而已，東晉道安的〈摩羅鉢羅若波羅蜜經鈔序〉被錢鐘書認為「吾國翻譯術開宗明義，首推此篇」。<sup>7</sup>道安在該序中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sup>8</sup>之說。佛經從西域傳入中土，當時的佛經翻譯家對之態度清晰可見。如果說「五失本」的實質是講出了佛經翻譯者們應遵循的翻譯原則，那麼「三不易」就從翻譯家對佛經的態度這一角度道出了這種

<sup>1</sup> 相關論述可參見崔峰，〈翻譯家魯迅的「中間物」意識——以魯迅早期翻譯方式的變換為例〉，《中國翻譯》，2006 年第 6 期，頁 14-18。

<sup>2</sup> 魯迅，〈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二）〉，《魯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52。

<sup>3</sup>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82。

<sup>4</sup> 謝天振，〈論譯學觀念現代化〉，《中國翻譯》，2004 年第 1 期，頁 9。

<sup>5</sup> 陳福康，〈支謙的佛經譯論開篇〉，《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6。

<sup>6</sup> 同上書，頁 6-7。

<sup>7</sup> 摘自陳福康，〈道安論五失本三不易〉，《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 年），頁 10。

<sup>8</sup> 同上。

翻譯標準產生的原因。正如謝天振所言，佛經作為宗教典籍成為了翻譯者們「頂禮膜拜的物件」，他們對之採取仰視的態度，翻譯時小心翼翼，唯恐把聖哲們的微言大義傳錯給了後世的凡夫俗子們。劉宓慶也認為：

中國的翻譯始於佛經經書，經書被視為『聖典巨構』，聖典是不可『析疑瀆』的，其時情形正如〈法句經序〉所描述的，『座中』（聽經者，皆為僧人）異口同聲地附和盲從論，曰『明聖人意深邃無極』，讀不懂也只能『苦念三冬』。（這與魯迅要求讀者讀他「硬譯」的作品「嚼一嚼，也許能懂」何等相似——筆者注）《高僧傳》也描寫過當時尷尬的困境：『梵客華僧，聽言揣意，方圓共鑿，金石難和，……咫尺千里，覲見難通，』惟有歎息聖典『不可解』。中國古代對佛教傳統有一種執著的敬畏，如果自己看不懂經書，只有『自慚形穢』的餘地。若有懷疑而加以論證，則難免于殺身之禍。這種對經典的盲從代代有加，幾乎成了封建宗法文化的『遺傳基因』。<sup>9</sup>

佛經初入中土，翻譯家們對其未曾有過深入的瞭解是必然的，在不了解其精髓的前提下，又要把這些被他們視作聖典的文章翻譯進來，同時又擔心有違先哲本義，最好的辦法自然就是提倡直譯。但這種直譯還不可能採取符合當時譯入語表達習慣的文法，因為佛經初入中國時，簡陋淺缺，學者們還未能達到以經解經的地步，所以在翻譯中運用字句相對的「硬譯」法將是最好的翻譯方法，避免了因個人猜度而褻瀆聖賢思想的可能。正如上文提及，支謙就承認這樣翻譯佛經的效果將會是「詞朴」。

我們再來觀察文藝理論、馬列著作傳入中國時魯迅的態度。1927年以前，魯迅翻譯的文藝理論作品主要是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出了象牙之塔〉等論文。因為魯迅在1927年之前的主要精力是放在譯介弱小民族及源自俄國、日本的反映人民苦難、民族解放運動、揭露黑暗的文學作品方面，對文藝理論瞭解甚少。到1927年以後，才開始側重於蘇聯革命文學和無產階級文學理論方面。其中的原因主要有1919年俄國「十月革命」勝利，馬列思想開始被一些「無產階級革命家」介紹到中國；同時，因為與創造社、太陽社展開了「革命文學」的論爭，「擠」著魯迅去閱讀了一些馬列著作。對於以前知之甚少，初入中國的文藝理論、馬列著作，魯迅憑著自己的主觀理解去進行意譯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採取直譯的時候，也不可能像他翻譯域外文學作品那樣得心應手地使用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的語句。在魯迅早期的翻譯中，他之所以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中採用了流暢地直譯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能深度體會這些作品的精神實質，能與原作者產生思想上的共鳴。而對於初入中國的文藝理論、馬列著作，魯迅能領會其中多少實質內涵，答案不言而喻。對於一個被「擠」著他去閱讀這些作品的翻譯家來說，又有多少可能讓他主動與原作者產生心靈的默契和溝通？所以，我們可以認為當魯迅面對多部他所不熟知的文藝理論、馬列著作時，其心態與當年佛經初入中國時翻譯家們把佛經奉為聖典的心態是一樣的。

再如錢理群所言：

魯迅當年滿懷熱情支持辛亥革命，參加新文化運動，但到了1925年他發現中國並沒有發生變化……他覺得單純的思想啟蒙不行，必須和一定的社會力量結合起來，參與到社會改革運動（包括武裝鬥爭）中去……而在當時的中國，惟一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農革命運動。因此，魯迅與之合作幾乎是惟一的選擇。<sup>10</sup>

<sup>9</sup>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頁76—77。

<sup>10</sup>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頁46。

與此同時，1920 年代末期，恰是魯迅思想發展的「轉向」時期，通過與各方展開革命文學論爭，他翻譯、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探索文學與革命的關係，開始形成自身的階級文學觀。魯迅對無產階級文學意識的高揚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共產黨所宣揚的無產階級文學觀。不論魯迅選擇與共產黨合作的真實心態如何，二者之間的關係在 1920 年代末漸行漸近則是不爭的事實。故而可以想見，魯迅在翻譯這些被共產黨視作理論宣傳重要方面的文獻，其小心翼翼、誠惶誠恐、唯恐出錯以招致批評的心態可想而知。

由此可見，魯迅與當年佛經翻譯家的情境極為相似。在其翻譯活動的背後體現了一種「譯經意識」，它既指一種翻譯態度、文化態度，也指翻譯方法；後者包含在前者之中。由於譯者在主觀上對原作的尊崇、敬畏，產生了亦步亦趨的翻譯方法。譯者「懷抱惟恐不能準確、充分傳達原作意義，惟恐褻瀆、改變了原作的心態從事翻譯」。<sup>11</sup>

那麼魯迅本人在主觀上是否具備這種譯經意識呢？首先，從魯迅的購書單中可以發現，「1912 年購書 92 種，1913 年 87 種，這些書包括歷史、藝術性散文、詩歌、文學批評、佛經和考古發現的古碑刻的拓本。1914 年購買的 161 種中，有 70 多種是佛經」。<sup>12</sup>魯迅對佛典下了很大工夫，其鑽研之精，領會之深，如許壽裳所說，是一般人所不及的：「民三以後，魯迅開始看佛經，用功很猛，別人趕不上。」<sup>13</sup>其次，魯迅也研究了不同時代佛經的翻譯特點，並且肯定了對佛經採取直譯的翻譯方法。1922 年，魯迅針對一些復古的「國學家」提出的「多放幾個譯者進去，如柴霍夫、屠格涅夫、高爾該、蘇德曼、德謨克拉西等，使舊文學家看了莫名其妙才是」的論調，反駁道：

其實是，現在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們的譯例推出原音來。

……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尚」，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譯怎麼譯，不但用不著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sup>14</sup>

1929 年，梁實秋對魯迅的「硬譯」發難，魯迅以「唐譯佛經」為例，說明中國由於文法不完備，歷來就很有些生造和引起變遷的情形：

中國的方法，比日本的古文還要不完備，然而也曾有些變遷，例如《史》《漢》不同于《書經》，現在的白話文又不同于《史》《漢》；有添造，例如唐譯佛經，元譯上諭，當時很有些「方法句法詞法」是生造的，一經慣用，便不必伸出手指，就懂得了。現在又來了「外國文」，許多句子，即也須新造，——說得壞點，就是硬造。

<sup>15</sup>

有學者就指出：

唐代和元代這類翻譯多為直譯，保存了原文的一些語法結構，有的詞還用漢語音譯，對當時及後來的漢語詞彙和語法，都產生過不小的影響。例如華梵（胡）結

<sup>11</sup> 王友貴，《翻譯家魯迅》（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6。此外，鍾厚濤、胡欣欣〈盜火者的心跡——魯迅「直譯」主張的原因探究〉，《西安外事學院學報》，2007 年第 3 卷第 1 期，頁 68—69）一文中也提及了「譯經意識」。但王友貴和鍾厚濤等人的文章未對佛經譯者翻譯心態、魯迅對佛經翻譯的認識進行充分梳理，亦未從翻譯與政治的關係層面考察魯迅「硬譯」中的「譯經意識」。

<sup>12</sup> 波茲德涅耶娃著；吳興勇、顏雄譯，《魯迅評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年），頁 121。

<sup>13</sup> 許壽裳，〈看佛經〉，《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 年），頁 44。

<sup>14</sup> 魯迅，〈熱風·不懂的音譯〉，《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396—397。

<sup>15</sup> 魯迅，〈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199—200。

合的譯經文體，就在譯本中保留了相當多原典的特點，如原典的反復叮嚀，高度誇張的表現，倒裝句、提綴語的大量運用等，都豐富了漢語的新因素。<sup>16</sup>

此外，魯迅對嚴復翻譯的評論可以看到他對直譯的推許以及對中國歷史上各個時期譯經特點的熟諳。魯迅在提到《天演論》時，用「譯述」來概括嚴復的翻譯行為。在魯迅看來，嚴復的翻譯正如嚴氏自己所說的「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於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sup>17</sup>在「信」上的不足，讓魯迅對這樣的譯法不足為訓。而嚴復後來的譯本，則「看得『信』比『達雅』都重一些」。<sup>18</sup>魯迅說嚴復的翻譯「實在是漢唐譯經歷史的縮圖」：

中國之譯佛經，漢末質直，他沒有取法。六朝真是「達」而「雅」了，他的《天演論》的模範就在此。唐則以「信」為主，粗粗一年地，簡直是不能懂的，這就仿佛他後來的譯本。譯經的簡單的標本，有金陵刻經處匯印的三種譯本《大乘起信論》……<sup>19</sup>

魯迅對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佛經翻譯的風格和特點的研究之深、之精確由此可見一斑。

### 三、探源二：知識份子、政治環境的操控與「硬譯」

上文提及譯者在面對經典文獻時格外小心翼翼，否則歪曲了原文，招致批評不說，還可能因此獲罪。就當時魯迅翻譯的政治環境而言，普通學者、大眾固然可以對魯迅的翻譯進行批評，魯迅也可以從容地與之進行辯論；但當魯迅開始成為共產黨所認為的自己陣營中的「親密戰友」之後，他的翻譯一旦遭致批評就不再是簡單的學術或翻譯實踐問題，而就涉及到一個翻譯家、知識份子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係——這一複雜現象了。翻譯家在受到外在政治環境的影響、操控下，譯者的主體性亦會受到極大限制。

以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為代表的翻譯研究派把「翻譯置於一個廣闊的文化背景中進行研究，強調歷史意識和文化觀點」，勒菲弗爾認為翻譯研究應「與權力、思想意識、贊助人和詩學結合起來」，同時他還指出：「翻譯與權威和合法性有關，最終與權力有關」，「國家往往要找一些信得過的譯者翻譯一些重要的書籍，即所謂『受信任的翻譯家』。所以翻譯與信任與否關係。但信任是一個問題，稱職與否是另一個問題。正如歌德所說的：『受信任的譯者比好的翻譯更重要，儘管受信任的譯者的譯文不一定好』」。<sup>20</sup>因此，「翻譯確實不是一個簡單的語言文字的轉換過程，而是一個文化政治行為。在這樣的文化政治行為中，譯者首先要服從的不是原文，而是譯入語文化中的道德規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等等。」<sup>21</sup>

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所謂「正統」宣傳話語中，魯迅都被視人共產黨人的親密戰友和堅定支援者、擁護者，認為他的後期已經成為「一個徹底的唯物主義者」。<sup>22</sup>但是，需要質疑的是，魯迅與共產黨之前是否真的到了親密無間的

<sup>16</sup> 鄭欣淼，《魯迅與宗教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頁101—102。

<sup>17</sup> 嚴復，〈《天演論》譯例言〉，收於牛仰山，《天演之聲——嚴復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147。

<sup>18</sup>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訊〉，《魯迅全集（第四卷）》，頁381。

<sup>19</sup> 同上。

<sup>20</sup> 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頁159—160。

<sup>21</sup> 謝天振，〈譯者的誕生與原作者的「死亡」〉，《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4期，頁35—36。

<sup>22</sup> 陳福康，〈魯迅對譯學理論的重大貢獻〉，《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地步？二者之間究竟是種怎樣的關係？魯迅當時是處於一個怎樣的環境中？這一處理又對他在翻譯方法上的擇取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我們首先從魯迅的創作、書信、親友的回憶中我們觀察魯迅當時的政治心態。

1929年5月14日，當魯迅還在北上省母的火車上時，許廣平寫了封信給魯迅，其中附了封許廣平寫給她在河北第一女子師範的同學好友常瑞麟，信中說魯迅的脾氣是「甯不知人待我厚，我亦欲捨身相報」，然而「面面受敵，心力交瘁，周先生病矣」，「他本抱厭世，置病不顧」。<sup>23</sup>

到了1930年初，魯迅就投身於直接的政治鬥爭中了。2月13日「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馮雪峰回憶說：

在上海的黨中央希望魯迅也做「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的贊助者，派人來告訴我，要我先徵求魯迅的意見；我去和魯迅談了，記得他當時的表示是不大同意這種方式，認為一成立就會馬上解散了……<sup>24</sup>

3月21日，魯迅致章廷謙的信說：

自由運動大同盟，確有這個東西，也列有我的名字，原是在下面的，不知怎地，印成傳統時，卻升為第二名了（第一是達夫）。近來且往學校的文藝團體演說幾回，關於文學的。我本不知「運動」的人，所以凡所講演，多與該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已以為大出風頭，有些人則以為十分可惡，謠誑謗罵，又復紛紜起來。半生以後，所負的全是挨罵的命運，一切聽之而已，即使反將殘剩的自由失去，也天下之常事也。<sup>25</sup>

1930年3月2日，「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3月27日，魯迅在致章廷謙的信中談到了他在這會場上的觀感，其中說到「梯子之論，是極確的……我十年以來，幫未名社，幫狂飆社，幫朝花社，而無不或失敗，或受欺，但願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終於未死，所以此次又應青年之請，除自由同盟外，又加入左翼作家聯盟」。<sup>26</sup>魯迅的這番感悟道出了他加入「左聯」的真實目的，並非很多人所認為的魯迅當時的思想境界已與馬列思想相差無異、全心擁護共產黨的一切方針政策。魯迅加入「左聯」無非還是要繼續實踐他的「梯子論」，希望「有英俊出於中國之心」，寧願自己作梯子，讓年輕一代「真能由此爬得較高」。<sup>27</sup>

當時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李立三很看重魯迅的能量，約請魯迅同他見面，見面時（1930年5月7日）還有潘漢年和馮雪峰在場。李立三希望魯迅像法國的巴比塞一樣，發表一篇宣言，表示擁護共產黨的各項政治主張，並且說：「你在社會上是知名人物，有很大影響。我希望你用周樹人的真名寫一篇文章，痛罵一下蔣介石」。<sup>28</sup>魯迅覺得這樣做了他勢必要亡命國外，對國內倒起不了什麼作用了，還不如照這樣寫點文章，還能發揮點作用。李立三約見魯迅的具體目的沒有達到，但他在白色恐怖的環境下約他秘密想見，可見是把魯迅完全看作

---

2003年），頁286。

<sup>23</sup> 摘自朱正，《周氏三兄弟》（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頁179。

<sup>24</sup> 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雪峰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79。

<sup>25</sup> 魯迅，〈書信·致章廷謙（300321）〉，《魯迅全集（第十二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6-7。

<sup>26</sup> 同上書，頁8。

<sup>27</sup> 同上。

<sup>28</sup>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18頁。



是可以信賴的自己人了。<sup>29</sup>魯迅所說的亡命國外，自然是指當時掌握國家統治權且視共產黨為敵對陣營的國民黨對他的迫害。魯迅的看法非常準確地揭示了他當時的生存狀態：共產黨想極力吸引他、徹底同化他；而這樣的結果就是遭到國民黨的迫害，可以說魯迅是在兩個政黨政治鬥爭的夾縫中生存。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魯迅怎能不感到「心力交瘁」呢？

1935年11月8日蕭三從莫斯科來信，轉達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和康生的鬧意見，提出解散「左聯」。信由魯迅轉給周揚，周揚、夏衍這些領導左聯的黨員作家，和黨中央失去了聯繫，看了蕭三的來信，決定解散「左聯」，另組統一戰線性質的文藝家協會。魯迅不贊成解散「左聯」，也決定不加入新成立的文藝家協會。這樣，他就捲入一場是非之爭了。<sup>30</sup>從當時他寫的一些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態度和心情。

1936年4月5日致王治秋的信說：

我們 xxx（這裡被收信人塗去的三字原是「這一翼」）裡，我覺得實做的少，監督的太多，個個想做「工頭」，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現在此翼已經解散，別組什麼協會之類，我是決不進去了。但一向下來的事，自然還是要做的。<sup>31</sup>

4月23日致曹靖華的信說：

這裡在弄作家協會，先前的友和敵，都站在同一陣圖裡了，內幕如何，不得而知，指揮的或云是茅與鄭，其積極，乃為救《文學》也。我鑒於往日給我的傷，擬不加入，但此必將又成一大罪狀，聽之而已。<sup>32</sup>

文藝家協會的一個贊助者何家槐把協會的章程、緣起這些文檔寄給魯迅，寫信邀他入會。魯迅4月24日回信說：

我曾經加入過集團，雖然現在竟不知道這集團是否還在，也不能看見最末的《文學生活》。但自覺于公事並不益處。這回範圍更大，事業也更大，實在更非我的能力所及。簽名並不難，但掛名無聊之至，所以我決定不加入。<sup>33</sup>

1936年4月26日，被中共中央派到上海工作的馮雪峰去見魯迅。馮雪峰回憶這段見面時說：

他（指魯迅——筆者注）一面不習慣地同我握手（魯迅不太習慣握手），一面悄然地說：「這兩年我給他們擺佈得可以！」……後來談到上海當時文藝界的情況，他神情顯得有些憤激……其中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我成為破壞國家大計的人了」，另一句是「我真想休息休息」。<sup>34</sup>

這裡的「擺佈」，大約包括與林默、紹伯相關聯的一類事：「破壞國家大計」即指他不肯加入「文藝家協會」。

1936年7月17日，魯迅給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去信說到：「當病發時，新英雄們正要用偉大的旗子，殺我祭旗，然而沒有辦妥，愈令我看穿了許多人的本相……在這裡真要逼死人。」<sup>35</sup>這裡說的，是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倡者攻擊他不參加文藝家協會的事。

這些材料反映了魯迅當時所處的政治環境，他與共產黨之間的關係：因腹

<sup>29</sup> 材料引自朱正，《周氏三兄弟》，頁186—187。

<sup>30</sup> 材料引自朱正，《周氏三兄弟》，頁246。

<sup>31</sup> 魯迅，〈書信·致王治秋（360405）〉，《魯迅全集（第十三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349—350。

<sup>32</sup> 魯迅，〈書信·致曹靖華（360423）〉，《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361—362。

<sup>33</sup> 魯迅，〈書信·致何家槐（360424）〉，《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363。

<sup>34</sup> 材料引自朱正，《周氏三兄弟》，頁248。

<sup>35</sup> 同上書，頁255—256。這封信於2003年被發現，尚未被收錄進《魯迅全集》中，它折射了魯迅當時的思想與情感，見證了一段歷史，顯得彌足珍貴。

背受敵，必須「橫站」，格外吃力；既要準備敵營裡的殊死鬥爭，又要時刻防備著來自戰友陣營裡的冷箭。長久以來魯迅是在國共兩黨的夾縫中生活。他固然反對國民黨的白色恐怖，但他卻不想完全靠攏共產黨，對其方針、政策頗有不滿之處。很多情況下，他是在做一種被迫的選擇，被動接受共產黨的一些任務和政策，迫使他必需選擇一條陣營以為自己的生存計。所謂「紅色光環下的魯迅」更有諸多身不由己的選擇。他選擇與共產黨合作，當然也有對革命同情以及他繼續他早期的「志在革新的」一面——「然以昔曾弄筆，志在革新。故根源未竭，仍為左翼作家聯盟之一員。」<sup>36</sup>同樣，他閱讀、翻譯馬列著作也經常是出於一種生存、論爭的需要。作為一個極具號召力的文壇領袖，共產黨自然是希望把他納入自己的陣營中來，但我們必需看清，魯迅早期不是通過他對馬列著作的創作、翻譯而贏得聲望的。而 1920 年代末以後，他所做的很多事，所翻譯、評論的文章很多已經不能像他早期那樣自由表達以實現他改造國民性的真實理想。

馮雪峰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之一甚至直接參與了魯迅對文藝理論、馬列著作的翻譯工作。從 1929 年的《魯迅日記》中可以看到馮雪峰對魯迅翻譯的普列漢諾夫的〈藝術論〉進行了校對，並獲得了魯迅給他 50 元的校對費。許廣平回憶：雪峰甚至可以「強迫命令」先生，她把他們之間的談話比喻為「韌的比賽」，「聽聽他們的談話，覺得真有趣，F（指馮雪峰）說：『先生，你可以這樣這樣的做。』先生說：『不行，這樣我辦不到。』F 又說：『先生你可以做那樣。』先生說：『似乎也不大好。』F 說：『先生，你就試試看吧。』先生說：『姑且試試也可以。』於是韌的比賽，F 的目的達到了。」魯迅對這種「強迫命令」是感覺到了的，他說：「有什麼辦法呢，人手又少，無可推諉。至於他，人很質直，是浙東人的老脾氣，沒有法子。他對我的態度，站在政治立場上，他是對的。」陳望道當時就明白地說過：「今天許多青年受魯迅的影響，但他（指馮雪峰）不但受了魯迅的影響，也時時刻刻企圖影響魯迅的。」<sup>37</sup>作為譯者，魯迅翻譯的自主性客觀條件上受到了外在權力的影響和制約，在這裡一目了然。正如魯迅自己所切身體會到的「現在思想自由和生存還有衝突」。<sup>38</sup>很顯然，共產黨看中的更多是魯迅的聲望、地位，以及他作品的號召力，這些都成為魯迅被「信任」的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在共產黨眼中「受信任的譯者比好的翻譯更重要」。

從魯迅主觀上講，他也不具備對馬列著作進行充分闡釋的能力，畢竟魯迅對這一領域並未進行過深入地研究。一旦按自己那種不徹底的所謂共產主義的思想進行翻譯，必然會受到共產黨的指責。正如馮雪峰在「政治立場」上堅持要魯迅照他的要求辦，共產黨把魯迅視作可以「信賴」的對象以為宣傳無產階級的文藝政策服務，任何對原文的歪曲而導致與無產階級文藝政策的背離，受到共產黨員的圍攻是必然的。就連魯迅不願參加一個文學團體，也會遭致攻擊，一下子變成了「破壞國家大計的人」。

所以，主客觀的條件決定了魯迅採用「硬譯」的翻譯方法來翻譯那些馬列著作，用絕對地忠實原著，來避免可能遭到的指責。「硬譯」此時就成了魯迅為生存計的一種策略——服從譯入語的意識形態以獲得生存的權利。

<sup>36</sup> 魯迅，〈書信·致李秉中（310204）〉，《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37。

<sup>37</sup> 張小紅，〈馮雪峰與魯迅「偷運軍火給奴隸」〉，《中華讀書報》，2000 年 4 月 10 日。

<sup>38</sup>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八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90。

需要指出的是，魯迅「左傾」後的思想境遇與政治境遇具有一定的複雜性。上述史料一方面體現了魯迅對共產黨的操控有所不滿，在思想上仍保有一定的自主性；但另一方面，共產黨視魯迅為自身宣傳陣營的一分子，不論魯迅的主體意識如何，政治意識形態對魯迅的「關照」是主動和必然的：上文所舉馮雪峰對魯迅翻譯馬列著作時的干涉及魯迅為此感到的無奈即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不論魯迅出於何種心態和目的與共產黨漸行漸近時，共產黨的操控已然如影隨行、客觀存在。譯者的主體性亦會因此受到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硬譯」是對原文的絕對服從，而魯迅又服從了譯入語的意識形態，似乎與勒菲弗爾的觀念有所出入。但事實上，魯迅對二者的選擇有一個前後次序的問題，他是先考慮到要服從譯入語的意識形態，才就如何實現這一目的而做了翻譯方法上的選擇。恰恰體現了勒菲弗爾所說的「在這樣的文化政治行為中，譯者首先要服從的不是原文，而是譯入語文化中的道德規範、意識形態、詩學觀念」。孫藝風也指出：

意識形態之所以名聲不佳與權力的結合有關，就翻譯而言，權力可以決定譯什麼和不譯什麼，甚至包括怎樣譯。意識形態的敏感性在於與社會現實的相關性，並因此可能引起一些政治後果，因為意識形態可以轉換成某種政治行動。翻譯可以對某種意識形態進行解釋和處理，使其具有或不具有轉換成政治行動的可能性。<sup>39</sup>

錢理群曾就知識份子與政治、政治家的「歧路」這一問題做過精闢論述：

主要從事政治活動的政治家與主要從事精神產品創造的知識份子（含文藝家），社會分工的不同，使他們處於不同的社會地位，有著不同的勞動方式、生存方式，進而造成了他們不同的思維方式、心理素質，這是形成政治家與知識份子（含文藝家）「歧路」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像魯迅所分析的，從事精神產品創造的知識份子，精神自由的要求對於他們具有首要的意義；但在政治家看來，自由僅僅是一種手段，為了某種更高得益，一定時候限制自由是必要的。<sup>40</sup>

#### 四、探源三：文網與「硬譯」

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很多作品的問世並非一帆風順，魯迅當時發表作品、出版著作經常需要先面臨掌探文網的國民黨審查機關的審核。該因素也影響到了魯迅採取策略性的手段以使其譯作得到發表的可能。

首先，魯迅對中國的文網、他親身經歷的日本文網以及他所瞭解的其他國家的文網有著深刻的體會和認識，這種認識程度的深刻性促使其採取一定策略性的翻譯手段。魯迅的著作中就記載了日本、蘇俄如何實行禁書的行徑。1905年，日本文部省應清政府所請頒佈了《清國留學生取締自由》，其中就包括檢查書信等條令。後來魯迅又親歷了日本社會黨被強令解散（魯迅曾購讀其發行的《社會主義研究》）、社會黨的機關報《平民新聞》的再次查封、劉師培夫婦所辦的《天義報》被逼令停刊、章太炎主編的《民報》被封禁、梁啟超的「政聞社」被取締等一系列事件。當魯迅在翻譯俄國畢勒涅克的〈信州雜記〉時就發現「原譯本中時有缺字和缺句」，他揣度「是日本檢查官所抹殺的罷」。<sup>41</sup>魯迅從日文轉譯蘇聯文學理論作品的時候就發現其中不少刀筆吏的痕跡：「但於對蘇聯

<sup>39</sup> 孫藝風，《視角 闡釋 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54。

<sup>40</sup>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26—27。

<sup>41</sup> 魯迅，〈譯文序跋集·《信州雜記》譯者附記〉，《魯迅全集（第十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445。

文學理論的介紹，近來卻有一個大缺點，即常有刪節，甚至於『戰爭』『革命』『殺』（無論誰殺誰）這些字，也都成為 xx，看起來很不舒服。」<sup>42</sup>

當時的北洋、國民政府對於蘇俄作品的審查尤為嚴苛，魯迅形容之：「人一聽到俄羅斯，一看見紅色，就嚇得一跳；一聽到新思想，一看到俄國的小說，更其害怕，對於較特別的思想，較新思想尤其喪心發抖，總要仔仔細細底想，這有沒有變成共產黨思想的可能性？」<sup>43</sup>先是「五四」後段祺瑞根據日本方面的情報和建議下令查禁蘇俄政府出版的中文宣傳品。1928 年，未名社被北洋軍閥查封，其《未名叢刊》收有譯著，且大部分為蘇俄作品。1929 年 2 月，官方查禁「過激主義印刷物」的書刊八十三種。國民黨南京政府先後以「宣傳共產、宣傳赤化、鼓吹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等罪名由其「中宣部」和各地方的宣傳部下令查禁、焚毀對來自蘇聯的書籍，從 1929 年至 1936 年，就先後查禁、扣壓了數十種有關蘇聯的書刊。<sup>44</sup>而我們知道，魯迅從 1927 年以後，開始轉向主要對蘇俄文學的譯介，而其「硬譯」的翻譯方法基本上也都出現在翻譯蘇俄文藝理論、馬列著作上。

魯迅本人吃過不少審查機關的苦頭，其欲出版、發表的作品被「槍斃」不在少數，當時的環境根本不允許魯迅享有充分言論自由的權利。魯迅在對照中日兩國的檢查揣度時曾感慨：

日本的刊物，也有禁忌，但被刪之處，是留著空白，或加虛線，使讀者能夠知道的。中國的檢查官卻不許留空白，必須接起來，於是讀者就看不見檢查刪的痕跡，一切含糊和恍惚之點，都歸在作者身上了。這一種辦法，是比日本大有進步的，我現在提出來，以存中國文網史上極有價值的故實。<sup>45</sup>

1929 年，水沫書店出版了《科學的藝術論叢書》，原擬出 16 種，後被查禁，僅出 8 種，魯迅翻譯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與批評》即在此類。1930 年 4 月，魯迅曾建議與郁達夫合作將高爾基作品的日譯本譯成中文全集，但此項計畫在國民黨文網禁錮下未能完成。就連魯迅後來翻譯其一部童話集，發表時也多有阻礙：《俄羅斯的童話》中的九篇已經發表在《譯文》上另有七篇就無法繼續刊登，原因是「得檢查老爺批云意識欠正確」。<sup>46</sup>1933 年，魯迅翻譯了雅各武萊夫的短篇小說〈農夫〉，「但正只為這一題目和作者的國籍，連廣告也被上海的報館所拒絕」<sup>47</sup>。魯迅翻譯的不少後來編入《壁下譯叢》和《譯叢補》中的論文大部分都受到過國民黨的查禁，正如魯迅自己所說：「到今年（指 1935 年——筆者注），我的一九二六年以後出版的譯作，幾乎全被國民黨所禁止。」<sup>48</sup>「以上皆被禁止或絕版，無從購買。」<sup>49</sup>1934 年，國民黨在上海宣佈查禁書刊兩百餘種，其中標名「魯迅」的譯作有《果樹園》。魯迅翻譯〈毀滅〉的時候，國民黨實施的文化專制也在不斷升級。「刊登這篇譯作章節的《萌芽》（出至第五期時被查禁，改出《新地》，僅一期而終）也被查禁（發表至第二部第四節），魯迅譯書遂被腰斬。而上海各家書店對蘇聯譯作望而生畏，更是不敢承印這部

<sup>42</sup> 魯迅，〈書信·致唐弢（340727）〉，《魯迅全集（第十二卷）》，頁 492。

<sup>43</sup> 魯迅，〈集外集拾遺補編·關於知識階級〉，《魯迅全集（第八卷）》，頁 192。

<sup>44</sup> 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 年），頁 250—251。

<sup>45</sup> 魯迅，〈准風月談·前記〉，《魯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190。

<sup>46</sup> 魯迅，〈譯文序跋集·《俄羅斯的童話》小引〉，《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401。

<sup>47</sup> 魯迅，〈譯文序跋集·《十月》後記〉，《魯迅全集（第十卷）》，頁 217。

<sup>48</sup> 魯迅，〈集外集·俄文譯本《阿 Q 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魯迅全集（第七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年），頁 85。

<sup>49</sup> 魯迅，〈書信·致夏傳經（360219）〉，《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315。

書的單行本，神州國光社即聲明毀約，其他家書店更不敢心存僥倖。魯迅譯畢全書，最後交給了素有交情的陳望道等主持的大江書鋪。但是為避免被文網所罩，這家書店割愛了原書中的〈作者自傳〉、〈關於《毀滅》〉、〈代序〉、〈譯者後記〉等本文外的文字，並且也不敢用譯者的真名，換了一個魯迅的筆名『隋洛文』，以求平安，出版後也只能在內山書店和一些小書店內半公開發售，但即便如此也難逃「《毀滅》，大江書店印過，被禁止。現惟內山書店尚有數十本」的命運。<sup>50</sup>1934年，國民黨強令要求刪去《豎琴》的〈前記〉方准出售，理由是其中講到了「無產文學」。魯迅稱為世上罕見的「大厄」隨著國民黨焦頭爛額的對內對外政策愈加嚴峻，不僅「極平常的文章，也常被抽去或刪削」，「現在連譯文也常被抽去或刪削」。<sup>51</sup>令魯迅感到莫名其妙的是，連他翻譯的蘇聯兒童文學作家班台萊耶夫的童話《表》也險遭封殺，後幸得通過，離刊物出版卻只有三天了。<sup>52</sup>魯迅的晚年，幾乎陷入國民黨文網的層層封鎖中，著作被禁止。在他「今年大抵只做翻譯工作」<sup>53</sup>的困苦鬥爭中，翻譯同樣也面臨著封禁，為此他禁不住慨歎：「現在的生活，真像拉車一樣，賣文為活，亦大不易，連印翻譯雜誌，也常被檢禁，且招謠言；嫉妒者又乘機攻擊，因此非常難辦」，而「譯作根本就沒有人要看」。<sup>54</sup>

但「難辦」不等於不辦。譯介蘇俄文學作品是魯迅後期翻譯工作的重點。而國民黨審查機關對這類來自「赤匪」之邦的作品審查甚嚴，所以魯迅除了為爭取譯作得以發表、出版而進行的外部抗爭外，在譯作的翻譯技巧上採取一定的策略也成了他的選擇。雖然發表後的譯作意義多有晦澀，讀者不一定能一下子明白其中蘊意，但作品只要能發表在當時森嚴的文網下本身就是勝利，其次魯迅向來不懷疑當時有一批知識份子甚至普通民眾是可以讀懂他的作品的。魯迅很清楚地認識到，「硬譯」的結果勢必會造成語言上的不通順和讀者理解上的障礙，但魯迅心中有兩條底線，一條是希望讀者「費力嚼一嚼」，以致「也許能懂」；另一條是魯迅把自己譯作，尤其是那些貫徹了「甯信而不順」翻譯方法的譯作的讀者定位為「很受了教育」<sup>55</sup>這一層次。有了這兩條底線，魯迅就大可利用「硬譯」的翻譯方法來對抗審查機關的審查了。因為，對於那些文法不完全符合白話文閱讀習慣的作品來說，審查官員們多半是不會去做「費力嚼一嚼」以使他們自己能明白文意。這樣魯迅的譯作獲得出版、發表的可能性即大大增加。一旦作品發表，魯迅的第二條底線就發揮作用了。「很受了教育」的讀者們開始閱讀、分析這些譯自異域的作品主要是蘇俄的文藝理論、馬列著作。

## 五、探源四：語言的改造與「硬譯」及對魯迅語言觀的再思考

魯迅希望通過「硬譯」以對中文的句法、語法加以改造的觀點主要體現在如下表述中：

這樣費解，怎樣還可以稱為翻譯呢？我的答案是：這也是譯本。這樣的譯本，不但在輸入新的內容，也在輸入新的表現法。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太不精密

<sup>50</sup> 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頁 289—290。

<sup>51</sup> 魯迅，〈書信·致曹靖華（350207）〉，《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46—47。

<sup>52</sup> 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頁 300。

<sup>53</sup> 魯迅，〈書信·致山本初枝（350409）〉，《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623。

<sup>54</sup> 魯迅，〈書信·致曹靖華（350514）〉，《魯迅全集（第十三卷）》，頁 126。

<sup>55</sup>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382。

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字去熟，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辭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講書，也必須借助于粉筆。這語法的不精密，就在證明思路的不精密，換一句話，就是腦筋有些糊塗。倘若永遠用著糊塗話，即便讀的時候，滔滔而下，但歸根結蒂，所得的還是一個糊塗的影子。要醫這病，我以為只好陸續吃一點苦，裝進異樣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國的，後來便可以據為己有。這並不是空想的事情。遠的例子，如日本，他們的文章裡，歐化的語法是極平常的了，和梁啟超做《和文漢讀法》時代，大不相同；近的例子，就如來信所說，一九二五年曾給群眾造出過「罷工」這一個字眼，這字眼雖然未曾有過，然而大眾已都懂得了。<sup>56</sup>

關於魯迅的語言觀，首先需要認清的是：魯迅所認為需要改造的中國文指的是「五四」以後的白話文。從時間上看，魯迅與瞿秋白討論中國語文的改造問題已是 1930 年代初，距白話文的使用已用十多年時間，魯迅在對白話文使用的十多年的觀察裡自然已有不少心得，對其或褒或貶自有一番評判。另外，魯迅一生愛寫詩自成公論，但他主要寫的都是古體詩，包括新文化運動以後他提倡使用白話文，卻仍極少用白話文寫詩，這個現象頗耐人尋味。中國古體詩發展了一千多年，已經到了一個相當成熟的階段，當時新文化運動的許多幹將們寫詩時仍是以古體詩為主，對於這樣一種發展成熟、表意明確、使用起來駕輕就熟的文體他們是沒有放棄的。魯迅要改造的物件當是用白話文進行寫作的文章。

其次，我們再來分析魯迅翻譯時的語言「本位觀」問題。劉宓慶認為：「語言現實和語法邏輯的本位觀必然深深地影響著語言研究者的基本取向。」<sup>57</sup>在我看來，劉宓慶所說的語言「本位觀」指的是研究者在他的實際研究和他對研究的基本取向的論述中以何種語言為立足點。比如《聖經》翻譯家傑羅姆(Sanctus Jerome)提出（由希臘文譯成拉丁語時）應使拉丁語法則處於支配地位，由拉丁語「表達出外語的特徵」（*proprietas alterius linguae suis proprietatibus explicaret*），<sup>58</sup>這時傑羅姆就是以希臘文為其語言「本位」的。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和魯迅都主張讓外國的語言、文學來豐富本國的文化，但兩者的本質差別在於歌德要讓外國文化「德國化」，<sup>59</sup>而魯迅即極力在譯文中保留異化的痕跡（包括語法和內容），二位文豪的「本位觀」之異由此可見。但我認為：翻譯從本質上講是一種涉及到多語言、多文化的交際行為，一旦在翻譯過程中僅僅固守「本位」或是僅僅以「外位」為參照就把翻譯實踐推向了一種極端。比如西元三、四世紀翻譯佛經而成初稿的人多為天竺人，不熟諳漢文，國人又將佛經奉為天書聖典，惟恐僭越譯者，於是常常以梵文本位觀處理語文問題，導致了後世對佛學中的許多論爭。魯迅又何嘗不是如此，當他把馬列著作當為紅色經典亦步亦趨地進行翻譯時，就以譯出語（主要是日語）為本位觀來捨棄了漢語，其結果就造成了讀者閱讀此類文章的困難。因此，從「如何翻譯」的角度來講：翻譯應該做到「本位外位相調互濟，絕對化是違反科學方法論的」。<sup>60</sup>魯迅以譯出語為「本位觀」而捨棄漢語，反映了魯迅當年的一種文化心態。

我們強調「本位外位相調互濟」就是因為不同語言都有其自身的體系和特

<sup>56</sup> 魯迅，〈二心集·關於翻譯的通信〉，《魯迅全集（第四卷）》，頁 382—383。

<sup>57</sup>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頁 21。

<sup>58</sup> 同上書，頁 29。

<sup>59</sup> 同上書，頁 31。

<sup>60</sup>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頁 39。

點，即所謂「異質性」，王國維和朱光潛指出：漢語和西語在語法結構和詞意的表達上均有不同。朱光潛說：

拿中文和西文來比較，語句組織上的懸殊很大。先說文法，中文也並非沒有文法，只是中文法的彈性比較大，許多虛字可用可不用，字與詞的位置有時可隨意顛倒，沒有西文法那麼謹嚴，因此，意思有時不免含糊，雖然它可以做得很簡練。其次，中文少用複句和插句，往往一義自成一句，特點在簡單明瞭，但是沒有西文那樣能隨情思曲折變化而見出輕重疾徐，有時不免失之松滑。總之，中文以直截見長，西文以繁複綿密見長，西文一長句所包含的意思用中文來表達，往往需要幾個單句才行。<sup>61</sup>

因此，不同的語言只有特點的不同，而無優劣之分。而魯迅認為漢語「語法的不精密」、「思路的不精密」本身就是對本民族語法的一種否定，而未看到其「異質性」所在。魯迅完全以譯出語去比照漢語，極力用「硬譯」的翻譯方法在譯作中留下過於西化的痕跡，以譯出語為本位觀，用一種俯視的眼光來看待漢語，這本身就反映了魯迅把西語視作比漢語在語法上更為嚴密、表意上更為清楚的語言——這樣一種語言間存在不平等的語言觀。需要指出的是，我們說魯迅的這種語言觀是一種文化殖民的心態也好，是一種「對原文帶有奴性的忠實」<sup>62</sup>也好，是站在今人的立場上來看待之的。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這種觀念的正確與否。魯迅的這種觀念在當時的時代背景下有其特殊意義，且非孤立現象，包括瞿秋白、劉半農、錢玄同等當時一批知識份子，在提倡白話文運動、改革中國的語言文字、推進漢語拉丁化的進程中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這種文化心態。這與這批知識份子急切地希望民族富強、文化復興的迫切心態是分不開的。對於這段歷史的再闡釋，我們更應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以一種同情的眼光客觀地看待、分析之，而不能以簡單的標準加以定性。

第三，魯迅主張在翻譯的過程中一面「輸入新的內容」，一面「輸入新的表現法」，這實際上就涉及到了翻譯過程中原作意義與形式能否同時在漢語與西語之間得以轉換的問題。就魯迅「硬譯」的作品來看，逐字逐句的「硬譯」確實能多少體現西語的一些語法表達形式，但就意義的表達而言，那些連魯迅自己都覺得都「佶屈聱牙」的句子給讀者們在閱讀過程中造成不少障礙是不爭的事實。劉宓慶認為：「既實現意義對應，又實現形式對應……這在漢語與西方語言之間的轉換中是根本辦不到的」，因此劉宓慶從翻譯實踐的層面提出「漢外互譯必須放棄拘守形式的努力而傾全力於意義，這項不可忽視的事實」。<sup>63</sup>造成原作意義與形式在翻譯過程中不能同時在漢語與西語之間得以轉換的原因就是上文所提到的語言的「異質性」造成的。其實魯迅也感覺到了在漢語和西語兩種不同語系之間翻譯時的困難：「我倒不見得如此之愚，尋求和中國文相同的文國外，或者希望『兩種文中的文法句法詞法完全一樣』。我但以為文法繁複的國語，較易於翻譯外國文，語系相近的，也較易於翻譯，而且也是一種工作。」<sup>64</sup>

也許有人會提出質疑，我們現在所比較的不同語言的特點是基於當下或近幾十年來現代語言發展到比較成熟的階段而所作的歸納，劉宓慶所提到的語言

<sup>61</sup> 朱光潛，〈談翻譯〉，收於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頁358。

<sup>62</sup> 諾德指出了「過度忠實」（being too faithful）的另一種說法是 servility，即對原文帶有奴性的忠實。見 Christiane Nord,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91), 22.

<sup>63</sup>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頁78。

<sup>64</sup> 魯迅，〈二心集·「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全集（第四卷）》，頁199。

「異質性」之「質」也是針對現代語而言的。可我們注意到上文朱光潛於 1944 年所分析的漢語特點對現代漢語來說同樣適用，其原因就在於「語言決不會象社會那樣『爆發』革命」，「語言是千百代傳下來的社會『規範』；有生命力的語言（活著的語言）每天都在更新著，但是每一個微小的更新都是從原來的基礎出發的，都沒有『突變』原來的規模。社會的任何激變，都不可能將語言從一種形式（語言的外形）『突變』為另一種形式（另一種結構）。『突變』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是不可思議的」。<sup>65</sup>魯迅當年當然沒有這樣的認識，他對於中國白話文的急切改造，包括他提倡的漢語拉丁化都是反映出魯迅極力想讓漢語產生「突變」的情緒。孰不知外來語可以借鑒，但想讓白話文產生質變是不可能的。魯迅這種對漢語的過度失望，以致倒向借用西語來建構漢語的語法體系，這在當時並不是孤立現象，就當時的大環境而言，當時漢語語法的特點是「移中就西」。無論是《馬氏文通》還是《新著國語方法》，其間架都是模仿西方語法教本的，儘管它們對中國傳統語文學也有所繼承。到了 1938 年以後，學者們開始認識到一味模仿西方語法體系是不可能創建漢語語法體系的，借鑒西方的語言學理論可以，但最終還是要根據漢語自身的特點來創建。<sup>66</sup>

---

<sup>65</sup> 陳原，《社會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 年），頁 121—122。

<sup>66</sup> 龔千炎在《中國語法學史稿》（北京：語文出版社，1987 年）中將中國語法研究分為四個時期，分別為醞釀、萌芽時期（西元前 475—1897）；草創、模仿時期（1898—1937）；探索、革新時期（1938—1949）；發展、繁榮時期（1949—）。



主要參引文獻：

### 一、中文

- 王友貴，《翻譯家魯迅》，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5年。
-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
- 中國翻譯工作者協會《翻譯通訊》編輯部，《翻譯研究論文集（1894—1948）》，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4年。
- 牛仰山，《天演之聲——嚴復文選》，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2年。
- 朱正，《周氏三兄弟》，北京，東方出版社，2003年。
- 波茲德涅耶娃著；吳興勇、顏雄譯，《魯迅評傳》，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
- 郭建中，《當代美國翻譯理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
- 陳原，《社會語言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年。
- 陳福康，《中國譯學理論史稿》，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3年。
- 孫藝風，《視角 闡釋 文化——文學翻譯與翻譯理論》，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崔峰，〈翻譯家魯迅的「中間物」意識——以魯迅早期翻譯方式的變換為例〉，《中國翻譯》，2006年第6期。
-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
- 張小紅，〈馮雪峰與魯迅「偷運軍火給奴隸」〉，《中華讀書報》，2000年4月10日。
- 散木，《于無聲處聽驚雷》，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
- 馮雪峰，〈黨給魯迅以力量〉，《文藝報》1951年第4卷第5期。
- 鄭欣淼，《魯迅與宗教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
-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
- 劉宓慶，《翻譯與語言哲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1年。
- 錢理群，《心靈的探尋》，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錢理群，《與魯迅相遇》，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
- 鍾厚濤、胡欣欣〈盜火者的心跡——魯迅「直譯」主張的原因探究〉，《西安外事學院學報》，2007年第3卷第1期，頁68—69。
- 謝天振，〈譯者的誕生與原作者的「死亡」〉，《中國比較文學》2002年第4期。
- 謝天振，〈論譯學觀念現代化〉，《中國翻譯》，2004年第1期。
- 龔千炎，《中國語法學史稿》，北京，語文出版社，1987年。

### 二、外文

- Christiane Nord, *Text Analysis in Translation: Theory, Methodology, and Didactic Application of a Model for Translation-Oriented Text Analysis*, Amsterdam: Editions Rodopi, 1991.